荡涤污泥浊水 还网络清朗空间

随着“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正式启动，一场打击网络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战斗全面展开。

近年来，通过大力开展整治行动，网络文化环境有一定改观，但受利益驱使，网络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呈现出屡打不绝的态势，淫秽色情信息的暗流还在网络空间里涌动。一些非法网站和境外网站肆意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有些网络服务商、搜索引擎和移动智能终端、应用商店等推波助澜，大开方便之门；有的商业网站热衷于搞色情营销，有的打着性教育的旗号传播低俗下流的内容，有的制作运营带有淫秽色情内容的游戏……种种现象说明，打击网络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势在必行。我们要迅速行动起来，以更加坚强的决心和更加有力的措施把这股暗流打下去。

网络淫秽色情信息严重毒害社会风气、严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人民群众意见很大、反映强烈。网络风气是社会风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网络风清气正、健康向上，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网络歪风邪气盛行、色情信息泛滥，则会败坏社会风气。目前我国网民人数已经突破6亿，互联网在青少年中日益普及，影响越来越大。他们正处于成长的关键期，如果任由网络色情玷污纯净心灵，必将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伤害。对人民负责，对民族未来负责，对亿万家庭负责，就必须加强网络管理，坚决制止和打击网络淫秽色情信息。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都不允许淫秽色情信息肆意传播。一段时间以来，网络上有一股舆论对线上线下的“扫黄打非”行动冷嘲热讽，甚至指责谩骂，实在令人诧异。依法打击卖淫嫖娼行为、依法整治淫秽色情信息，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必须采取的行动。对这样的行动泼冷水、唱反调凸显了某些人价值观念混乱，是非不分、黑白颠倒。随着“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网络淫秽色情的社会危害性必将为广大群众所认识，也会给那些存在错误观念的人以教育、以警醒。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互联网企业必须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干干净净办网、依法合规赚钱。绝不能利欲熏心而放任淫秽色情信息泛滥，绝不能为博人眼球、赚取点击率而大打色情擦边球。为一己之私而牺牲社会公众的福祉，为眼前小利而损害国家民族长远利益，这样的企业必将受到舆论的谴责，也为法律所不容。

目前，网络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已经形成了一条非法利益链条，盘根错节，环环相扣。只有追根溯源、深挖彻究，打掉整个利益链条，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屡禁不止的态势。要坚持标本兼治，老虎苍蝇一起打，网上网下一起打，对那些为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提供平台和便利的同谋包括电信运营服务、网络接入服务、广告服务、代收费服务等要连带追责，务求打得彻底，防止死灰复燃。

打击网络传播淫秽色情信息事关青少年身心健康，事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弘扬，是一件顺民意、得民心的好事。我们相信，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一定会取得突出战果，使网络空间真正清朗起来。 人文

“天价学区房”启示教改大棋局

“不是一房难求，而是一平难求”“过去是‘拼爹’，现在是‘拼房’”……日前，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北京等19个重点大城市的义务教育在2015年实行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却引发一系列效应。最极端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京30万元一平方米的学区房。

就近入学该不该？该。这种教育资源分配方式，既非建立在权力大小上，也非建立在财富多少上，而是划地为片，显然更加公平。更何况，就近入学是法律原则，义务教育法中已有相关规定；也是改革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设想中，就有“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的部署。不管是重申就近入学，还是推行九年一贯制，相关部门的政策初衷，都是缓解择校压力、减轻家庭负担、促进教育公平。教育部门能以如此力度推动就近入学的新政，体现了改革的勇气和担当。

当然，新政策也引发了一些新思考。有人指出，流动时代、市场经济，就近入学难免会滋生出“学区房”现象，变成“价高者得”。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只是换了一种资源分配方式。除了少数“生在学区里、长在名校边”的幸运儿，大多数孩子想上名校的家庭，也许仍要面对另一场激烈的竞争。

按下葫芦浮起瓢，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会冒出来另一个问题，这正是进入深水区之后改革的烦恼，也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紧迫性。在三中全会决议中，“破解择校难题”是放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主题下，缩小校际差距更是“大力促进教育公平”的内容。可见，就近入学要发挥政策效应，前提是有充足的公共教育资源且分布比较均衡，学校与学校之间差别不大，孩子们在任何一个学校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没有这个前提，“就近入学”本身可能也会变成一种不公平。

在这个意义上，练好改革基本功、打好改革组合拳，虽然艰难却更加迫切，不仅要解决投入问题，也要解决思想问题。长期以来，学校是一个地区的脸面，相关部门希望有一两所“叫得响的学校”，因而倾斜资源，忘记了均衡；学校也容易把发展置于学生之上，忽略了公平；甚至教师也会往生源优秀、知名度高的学校主动流动，放松了职责。有小学语文特级教师曾表示，教育改革重点应是教师普遍轮换，待遇全部实现平等，教育资源才能自然合理分配。类似的建议，应该给改革者更多启示。

还要看到，我们之所以说改革是一项综合工程，就在于它可能牵涉方方面面。现实屡屡证明，每个人的理性选择，却可能演变成群体的不理性。催生天价学区房的，也正是每个家庭对孩子教育投入产出比的理性考量。事实上，在教育均衡化的过程中，学生和家长的参与也很重要。

改革不能单兵突进，而要协同作战，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的改革方法论。就近入学与学区房的矛盾、教育公平与资源均衡之间的纠结，再次显示系统性改革的至关重要。或许，是时候拿出更大决心和勇气，在教育领域铺开一场改革大棋了！ 张铁

令市场颤抖的“围攻”

今年3月底，定位高端的成都九龙仓御园突然大幅降价，260套降价房源一天之内全部售罄。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九龙仓的降价策略也引发了前期老业主的严重不满，其售楼部遭数百名愤怒的业主“围攻”，打出的横幅上书“无良奸商、价格欺诈、法理难容、坚决退房”。直至4月8日，该项目售楼部仍如临大敌，大厅内外皆有带着头盔的保安进行把守。

楼盘还是那楼盘，房子还是那房子，只不过几十天工夫，均价就从13000元/平方米降至8000元/平方米，老业主们感到自己“吃亏了”是肯定的，轮到我头上，我也会认为亏大了。但买房子吃了亏，是不是就有“围攻”售楼部的正当性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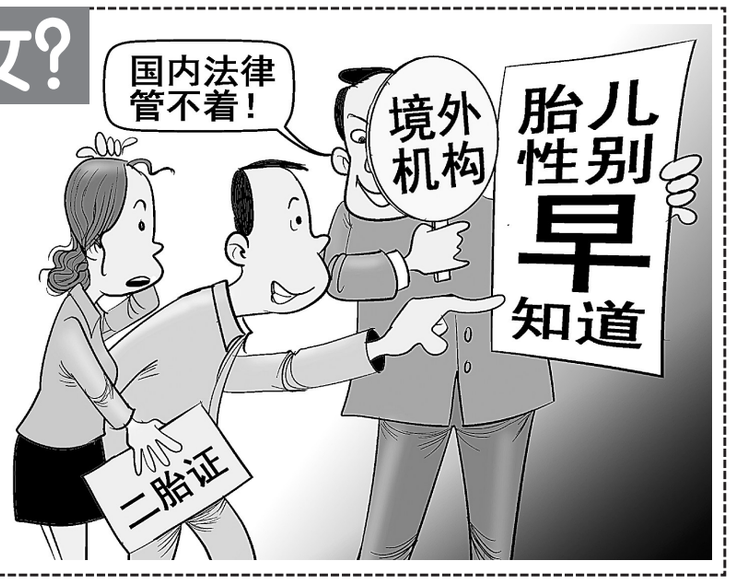
至少近六七年来，每遇到房价下降，就不免发生“围攻”一类的事件。“围攻”还算温和的，有的干脆就是“怒砸”售楼部。我高价买的房，现在你开发商降价了、不值这个价了，所以你要么补偿、要么退房。你若既不补也不退，那么你就是“奸商”，你就“法理不容”，就得“围攻”你、“砸烂”你。不过，人们也不难看出开发商似乎还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不降低房价。但不降低房价，或能满足“围攻”者的诉求，开发商可能就要跳楼了。

如果买了股票的人们在股市受损了，是不是也可以“团结”起来，去“围攻”或“怒砸”证券交易所呢？但似乎没人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如今大家都知道股市有风险。股市有风险，楼市就没有风险吗？难道楼市就只能涨不能跌吗？难道购房者就可以免于承担市场风险的责任吗？房价降了，你要找开发商索赔或退房；那房价涨时，如许多网友所言，开发商可不可以向你要求分一杯羹或要求你退房呢？再说，他若是高价能卖出，又何必降价自残呢？

一个市场主体在自由意志下大量购进黄金，那么一定是预期黄金要涨价了，如果涨了、赚了，证明预测准确，收益全归自己；如果跌了、赔了，证明预测不准确，风险也全归自己。房屋交易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购房行为竟有这样的特殊性：升值了好处归自己，贬值了风险却由别人来承担？人们往往习惯于动辄批评政府缺乏市场意识，其实批评者也未必就比他们所批评的对象更具有市场意识。

市场经济意味着机遇，也意味着风险；意味着博弈，也意味着规则；意味着波动，也意味着秩序。“围攻”售楼部的行为一再出现，令市场为之颤抖，但法治不应为之颤抖。没有法治，便没有秩序，也便没有市场。 滕朝阳

生男生女？



抽10毫升静脉血冷藏空运到深圳，由黑中介将血样转运至香港，胎儿性别检测报告出来后反馈给孕妇。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很多家庭想选择二孩性别，但又苦于内地禁令。于是一个跨香港、深圳，辐射到北京及其他省市的“寄血验子”服务应运而生。法律和医学专业人士提醒，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检验报告，不但承担着很高的法律风险，其可信度也值得怀疑。

焦海洋 图

信访信息化需警惕只坐诊不把脉

最高法10日开会部署在全国法院迅速开展网上申诉信访平台和远程视频接访系统建设工作。11日的全国网上信访工作现场推进会提出，到今年年底前，基本建成全国网上信访信息系统，实现信访业务全部网上流转。

实际上，网上信访、视频接访等信访信息化工作在多地多部门中早有实践。客观地讲，信访信息化在迅速响应群众合理诉求，把矛盾消弭在基层、消弭在萌芽状态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一些信息化的信访平台也有消极、懈怠现象，群众反映的诉求“如泥牛入海”，影响了党委政府公信力。在新一波信访信息化的大潮中，需警惕信访信息化过程中“只坐诊不把脉”的问题。

近年来，信息化已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信访也不例外。2013年全国共受理群众网上信访事项248万件次，同比增加10.9%，一些地方的网上信访量已经超过来信来访量。

这表明，信访信息化是助力和谐、赢得民心的好事。把信访信息化这一好事办好，不仅要建设好网络信访和视频接访平台，更要管好、用好这一平台，比如将投诉内容和处理结果透明化、阳光化，更要实现从网上到网下的联动，力争“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做好信访信息化工作，还需要从一开始就设计好、落实好收集群众诉求之后的跟踪监督、责任追究制度，确保群众可就地表达利益诉求、可随时查询办理进度、可评价办理情况。如果信访信息化仅仅点燃了群众信访的热情，却不能自始至终地做到尽可能满足群众的合理诉求，就一定会衍生新的不满情绪，形成新的信访问题。

信访信息化是拓宽信访渠道、降低信访成本、提升信访效率的具体举措，更要时刻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要抓细、抓小、抓实，在保障群众权益、助力社会和谐上取得新成效。

吴书光 雷欣成

兰州自来水污染当拿谁问责？

兰州近日自来水严重苯超标，最新的“初步判断”是，兰州石化上世纪80年代发生泄漏事故后污染物渗入地下，现在“忽然”渗入兰州威立雅水务集团水厂自流沟。随着事故的物理原因明晰化，公众越来越关心事故背后的管理责任，以及这种责任是否会受到认真追究。

在4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兰州市长袁占亭据说郑重表示：“对这次污水事件对广大市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我代表市委、市政府深表歉意。”

当地主要领导固然“已经道歉”，但道歉主要针对的是污染事件的社会影响，而回避了其中的政府责任。这样的道歉，兰州市民能接受吗？

公众现在亟欲发出的追问一大堆：兰州水厂自流沟与兰州石化的地下管网纵横交错，有没有人考虑过石化原料或产品渗透污染水厂自流沟的安全风险？兰州石化上世纪80年代污染物渗入地下，为什么没有得到必要的处理？有没有考虑到这种污染渗透的长期风险？个中除了企业环保责任，还有当地政府的监管责任。

当地政府还有另外三项责任：一是1个多月前，当地自来水就被报告“异味”，虽然有关部门已经否认此“异味”与苯超标的关联性，但“异味”具有安全风险警示作用，当地政府给人充耳不闻、麻痹大意的印象；二是迟至威立雅发现自来水苯超标18个小时后，当地才将事故公之于众，致使大量居民继续饮用了苯超标自来水。

其实还有一个貌似“历史遗留问题”，即兰州水厂自流沟建于上世纪50年代，属于“超期服役”，兰州市政府于2007年将全市自来水业务高价卖给威立雅水务，却没有对“超期服役”设施进行任何改造，给全市供水埋下安全隐患。虽然是前届政府欠债，现任政府不予亡羊补牢，亦属失职。

虽然，眼下尚处于对自来水污染来源的调查、分析与处理阶段，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政府建构起安全供水责任链，这起自来水苯超标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可以避免的事故发生了，当地政府就是责任链的中心环节，不予问责难以服众。

此前，我们对安全事故的责任追究不乏其例，但主要集中在矿业等安全生产领域，民生领域安全事故的责任追究明显不足。现在城市自来水屡屡惊魂，最后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自来水作为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之一，发生大面积污染，其安全风险有甚于煤矿、交通及一般环保事故。如何明晰其中的政府责任及其领导责任，是一个现实问题。

兰州自来水苯超标既已发生，当地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失职理应依法问责。不妨借此打造一个规范案例，明确类似供水事故发生后，地方政府及其领导责任在哪里、失职之后应当承担哪些责任，以及如何承担责任，以此明示天下。 杨于泽

预算公开不细化就没效果

从国家到地方，每一次预结算账本公开都被媒体盯住，且不缺新闻点。广州市各区市部门及镇街近日相继晒出的2014年“三公”经费预算账本，也被媒体注意到存在参差不齐，费用升降原因说明空洞，公开流于形式等问题。

广州各区继去年首次统一范本公开财政预算之后，今年又有了一定进步。如市对各区预算公开并无强制要求单列会议费，但已公开的基本都单列。总体看，各区“三公”及会议经费预算绝大多数都有所压缩，但也有不降反升的。那么压缩幅度是否已足够，下降或增加的具体原因和项目又是哪些，这就需要有详细说明，让人清晰地看到每项支出的依据，进而才能判断其合理与否。

然而，恰恰是在预算细化这个关键问题上还有不小的距离。从化区政府部门账本只有1张图片文件，400多字简单列出“三公”以及会议费各项数额、增减情况，增减原因基本未说明。花都区会议费预算高达2850万元，在十区市中“遥遥领先”，也没有会议内容、数量、规模等具体说明。

预算公开不细化，缺乏详细说明，公开的诚意与意义就大打折扣。试想，一个区的公务接待费预算过千万甚至几千万元，一个区级政府部门或一个镇会议费预算上百万或几百万元，这些老百姓眼里的“天文数字”背后无细致的来龙去脉，公车购置费“逆势上涨”而偏不列出购置车辆部门、数量和具体类型，公众依据什么来评判这些支出到底是否必要，合不合理？

向社会公开公共财政预结算账本的制度设计初衷，显然不是浅层次的为公开而公开，也不是仅为公开几个大数字，而是要告知公众每一笔公共财政的具体去向，接受社会各界的评判与监督。

广州公共财政预结算公开领跑全国，从市级到区级也都依然行走在制度设置不断完善和逐渐规范化的进程中。最终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预结算公开，也就是一分一厘是怎么用的都让公众一清二楚，这确需一个过程，但不等于预结算特别是社会关注的“三公”经费和会议费支出的明细可应付了事。

财政预结算公开艰难走到如今这一步，要实施彻底透明的根本性突破，除了制度设置要更规范完善之外，显然还需在监督上用力。一方面要从源头抓起，即提交人大审议的预算报告就要细化。不然，握有否决权的人大不给力，不让预算一开始就细化，审议时人大代表一边喊“看不懂”一边又举手通过，到向社会公开时又何来细化？

另一方面，要建立和落实监督问责机制。现在的问题是，每次到晒账本时都只是媒体“一头热”，一两个代表委员接受采访说几句，再加专家议论几句。即便是某个账本被质疑有问题，一两天过去就风平浪静，官员毫发不损。要改变这种状况，无疑需要人大、政协及纪检监察部门也来审视公开的账本，介入监督，对有敷衍行为的单位责任人加以问责。否则，预结算流于“应付式”公开就始终难取信于民。 羊文

“代跑”是没有体力 还是精神萎靡？

《中国青年报》近日报道了部分高校体育测试“代跑”现象。报道说，眼下正是很多高校进行学生体质测试的时节，最让学生叫苦的当属800米和1000米跑，对于一些跑步“困难户”来说，找人“代跑”成了顺利过关的捷径。报道说，浙江某高校大二学生小秦告诉记者，每次长跑测试结束后，田径场边上到处是学生的呕吐物，有的学生瘫坐在地上半个小时都缓不过劲儿来。这些学生平时大都不怎么锻炼身体。

今年1月，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下发《通知》要求，从2014年开始，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全面启动和广泛开展大学生“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主题群众性课外体育锻炼活动。但是，“代跑”现象，是单纯的身体问题吗？宅在宿舍睡觉，男生打游戏，女生看韩剧，边看边吃边哭，这不是精神现象吗？我们不知道，类似这样的高校的政工部门、团委、学生会、辅导员等组织和人员，在组织“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活动时，他们有没有去关注这部分学生的心灵世界？

没有个案调查，不知道这些学生处于这种精神状态的直接原因是什么，但是，高校的人文环境，是否与此有关？2012年7月1日，北大中文系举行毕业典礼，该系1984级本科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卢新宁对学弟学妹说：我唯一的害怕，是你们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规则能战胜潜规则，不相信学场有别于官场，不相信学术不等于权术，不相信风骨远胜于媚骨。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

卢新宁谈到的现象，与“代跑”现象，与“宅在宿舍睡觉，打游戏，看韩剧”之间，有没有什么内在联系呢？是什么让这些年轻人如此萎靡呢？他们曾经相信过什么，现在还有没有能让他们相信的？或者什么都不信？还有，那些并不萎靡的年轻人，又在相信什么，追求什么？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钱文

以“公私合作”缓解“土地财政”依赖

近日在一个论坛上，财政部一位副部长预计到2020年城镇化带来的投资需求约为42万亿元。目前城市建设资金主要靠转让土地的收入支撑是不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需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

何谓“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主要是财政部力推的PP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该模式正在全国多个省市推进。哈尔滨和洛阳作为试点城市，已经通过多个项目先行实践总结经验，而黑龙江、河南、浙江、湖南、福建、上海等多个省市正在密集展开调研，着手筹备项目。

所谓PPP是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基于具体项目的合作融资模式，适用于具有长期稳定收益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PPP具有三大特征：一是伙伴关系，二是利益共享，三是风险共担。目前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财政部门专门设立了PPP管理机构，负责推动PPP模式发展，履行研究设计、项目储备、融资支持、招投标管理、争议协调等职责。

看来PPP不是要不要做，而是如何做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可以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运营；在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中，民营企业更可以在农村新型经营方式方面发挥自己的优势。

城镇化是当今拉动内需的最主要抓手。各地在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的决定中，都对这一点予以特殊的关注，比如浙江强调要真正落实“非禁即入”原则，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中心镇、小城镇建设，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社会事业、文化产业、金融服务等领域，让民间资本在更多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完善公益类经营性项目土地出让政策，支持民间资本发展养老和健康服务产业。

这些领域如果政府都去做，可能会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民营经济也急需扩大经营范围。传统理论认为，公共产品都是由政府等公共机构来提供的，但是，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如今，公用事业的民营化可谓世界潮流，航空、供水等产品随着制度和技术的革新，许多业务就从公共供给中剥离出来，甚至连消防，在有些地方也实行私人供给。

世界上最早对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这一问题做探讨的是亚当·斯密。他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国防供给模式的变迁。他发现，“国防”，更为准确地说是战争，并非一开始就由国家提供，而是由私人直接提供(在最低级的狩猎民族里，人人都是战士)。目前，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条件，一是从公共产品的生产特性上分析，有些公共产品的生产具有可分割性，只要生产是可分割的，私人供给就有可能，如公路建设等。二是有些公共产品的价格外延边界是确定的，可以向消费者收费，因而可以由私人部门生产。三是有些产品的性质是可变的。随着知识、技术条件和收入水平的变化，供给模式也会发生变化，私人部门参与供给也就成为可能。

因此，我们要完善公共产品私人供给制度，第一，完善定价制度。政府应坚持“保本微利”原则。引入价格听证制度。价格听证可以为政府对公共产品的定价提供必要参考。第二，完善政府规制监管体制建设。要建立起完善的行政监管程序以及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要严格界定规制机构的职责范围和行使职权方式。第三，健全法律保障制度。公共产品的私人参与供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与市场化改革的必然选择，政府作为公共责任的直接承担者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需要为私人供给者提供良好的政策、制度、法律环境。

希望PPP能给我们带来最大的便利！ 叶青